

一次未能举行的毛泽东与

蒋介石会谈

（江苏）
杨世红

人们都知道 1945 年国共重庆谈判，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 1942 年下半年，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就都有意在西安或重庆举行会谈。这次拟议中的会谈虽然最终未能举行，但国共双方围绕此事所进行的接触，尤其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争取举行会谈所作出的努力，却对当时国共两党关系的缓和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 1941 年 1 月，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变，企图一举消灭新四军。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蒋介石不但未能达到消灭新四军的目的，反而受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此次反共摩擦的失败，使蒋介石认识到要在抗战中用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是困难的，也是国内外形势所不允许的。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主要军事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蒋介石认为：“美日开战，日本必败，中国得救。”因此，他决定对日采取单纯防御、保存实力的方针，以壮大国民党力量，等抗战胜利后消灭共产党。而在当时，他还不得不为“适应国际环境和抗日局势，对中共采取宽大政策”。基于这种原因，1941 年底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决定“和平解决”国共问题，即由先前的军事解决改为政治解决。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在积极考虑调整对国民党的政策，以缓和自皖南事变以来一直紧张的国共关系。1942 年初，毛泽东在透彻分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外局势的基础上，作出了国共关系可以改善的估计。他认为：一方面国民党虽然不会放弃有利时机反共，但它的反共活动又受制于客观条件，不能不有

所限制，因此两党关系不可能决裂；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好转势必影响中国，这也有利于两党改善关系。

形势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估计是正确的。到了 1942 年年中，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逐渐明朗，苏、美、英三大国不仅进一步加强了相互间的合作，而且它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都更加关心中国内部的团结，希望中国能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三大国的这种态度使蒋介石在处理国共关系时，不能不有所顾忌。除国际原因之外，国民党自身的财政和经济危机加深、国统区人民的反抗、一些地方势力离心倾向的加剧等因素也促使蒋介石、国民党不得不考虑缓和国共两党关系。

为了抓住有利时机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从 1942 年 6 月开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我军在日军向国民党进攻时，给予国民党军队可能的援助和配合；致电我军将领，强调要尽量避免国共军事摩擦；多次电告各地有关领导同志，不要公开宣传国民党的坏处，不要作国共好坏比较等等。一个最重要的举措就是中共中央在 1942 年 7 月 7 日发表了《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这个宣言反映了

中共对国民党政策的重要调整。宣言强调无论在抗战中还是在抗战后，国共两党均应团结合作，并承认蒋介石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宣言最后表示，中共“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

由于中共方面的努力和诚意，国民党也作出了某些和解的姿态，例如：允许《新华日报》有删节地刊登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蒋介石指派张治中、刘斐与中共恢复谈判等。在国共关系趋于缓和的形势下，蒋介石首先提出要同毛泽东举行会谈。

2 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突然约见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说他一个星期后将去西安，想在那里与毛泽东会面，并连说了两次，还要周恩来电告延安。

蒋介石此时提出与毛泽东会晤，一方面是做出改善与中共关系的姿态，以扭转他因发动皖南事变而造成的被动局面，同时，蒋也有现实的考虑：一是1942年上半年国民党接受外援的主要通道滇缅路被日军切断，蒋迫切需要开辟一条经苏联到达新疆的外援运输线，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改善与苏联和中共的关系；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并未放松对中国战场的压力，国民党需要中共军队的配合作战。

周恩来在与蒋介石会见后，立即致电毛泽东，报告了蒋约见毛一事，并认为虽然蒋介石“在态度上还看不出有何恶意”，但“其目的未可测”。他提出两个方法供中共中央选择：一是毛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与蒋会谈；二是要求蒋带周恩来到西安，然后由周飞回延安，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到西安见蒋。

8月1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表示他打算亲自与蒋会晤。当时，周恩来复电毛泽东，认为毛、蒋会晤时间“似嫌略早”，建议先由林彪或朱德与蒋会谈，“以打开谈判大门”，待具体谈判稍有眉目后，毛再与蒋会谈。

在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毛泽东仍倾向于立即与蒋会谈。8月29日和9月3日，他两次致电周恩来，强调他亲自与蒋会晤“有益无害”。

他在9月3日给周恩来的电文中说：“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时机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的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不解决也是值得的。”他还提出，如果蒋介石邀请他到重庆参加当年10月召开的参政会，他准备答应。

毛泽东从改善国共关系的大局出发，力主尽早与蒋会谈，而周恩来对毛泽东离开延安与蒋会晤问题十分慎重。与国民党长期谈判的经验使周恩来对蒋介石的政治手腕有更深的了解，他不能不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经反复考虑之后，9月5日，周恩来再次致电毛泽东，坚持认为，毛泽东“见蒋时机尚未成熟”，因为蒋介石目前并没有解决国共问题的诚意，并提出三条理由：（一）蒋介石所谓的政治解决只是要中共全盘接受他的条件，而决不是双方民主合作；（二）蒋对中共党和军队的观念仍然是吞并或大部消灭；（三）蒋对人的观念仍是包藏祸心，仍想打击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因此，周恩来认为毛、蒋会谈的前途只有两个：“一是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二是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安（此着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最后，中共中央经仔细研究，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决定在进一步判明蒋介石的意图之前派林彪去见蒋，然后再确定毛泽东是否与蒋会谈以及何时会谈。

3 9月17日，林彪一行到达西安，打算与蒋会晤。但此时蒋已离开西安回到重庆。林彪在与西安地区的国民党官员进行会谈后，于10月7日抵达重庆，13日，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双方寒暄后，林彪就向蒋介石说明，毛泽东打算亲自来见蒋，只因当时有病未能前来，待身体康复后即来与蒋会晤。蒋介石马上问：“你此次来渝，毛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余否？”林彪答：“我未动身以前，延安方面接得校长电报，毛先生即提交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并约我数度谈话。毛先生希望国共两党今后应彼此接近，彼此相通，彼此打成一片。”听到这里，蒋介石频频点头。但当林彪谈到国民党方面“有一

部分人总是希望挑起内战”，表示“决不允许国内再发生战争”时，蒋介石则一再看表，明显地不愿再听下去了。林、蒋第一次会晤就此结束。

此后，林彪又先后两次与蒋会谈，并会同周恩来多次与国民党代表谈判。毛泽东要求林、周在谈判中对国民党压迫等事，应极力忍耐，不提抗议，并向国民党表示，战后或反攻阶段具备北上条件时，八路军、新四军黄河以南的部队可开赴黄河以北。

由于此时国际形势仍有利于国共关系改善，再加上中共方面的让步，国民党这时也作出了一些缓和国共关系的姿态。11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共产党问题的决议案。该决议案宣称：只要共产党“不违反法令、不扰乱秩序、不分裂地方、不破坏统一……自当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12月16日，蒋介石在第二次会见林彪时表示，希望看到国共问题整个地迅速解决，不要零零碎碎，拖拖拉拉，并说：“中共是爱国的，是国家的人才。”

毛泽东这时仍然希望与蒋的会谈能够举行。12月1日，他致函蒋介石：“前承宠召，适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请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直到1943年1月，他在给彭德怀的信中，仍表示“到适当时机，我准备见蒋，以期谈判成功”。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国共关系的改善作出了真诚的努力。蒋介石虽然表面上希望缓和两党关系，但事实上他采取的是“拖”的方针，以等待有利的反共时机。这就注定了林彪与蒋介石的谈判，不可能取得进展。

1943年初，在苏联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盟军皆掌握了主动权，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同时，蒋介石政权内部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蒋介石认为新的反共时机即将到来，便开始酝酿发动新一轮反共高潮。1943年3月，蒋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为国民党再次发动内战制造舆论。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的反共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叫嚷：“取消共产党”，“交出边区”等。国共关系再度紧张，毛、蒋举行会谈已不可能。这样，解决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一次良好机会便被蒋介石、国民党葬送了。

(责编 沁 辛)

湖南省最东端有一个县叫醴陵。醴陵的先农坛自古有名。它是祭祀神农氏——中国农业之神的圣地，也是中国现代史上领导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毛泽东曾留下足迹的地方。

1927年2月初，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来到醴陵。两年前，他作为中国最早注意农民问题，并以此为工作重心的革命家，在三湘大地播下了农民运动的火种，如今，他来到最早倡导“播施百谷”的神农的故地。

毛泽东就下榻在先农坛附近的临近东门大街的一栋小楼房里。略作安顿，他便召集了一个会议。到会的有县委书记罗学瓚（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同学）、县农协委员长唐寄凡以及区委、区农协执行委员长等数十人。会场外由李季阶等武装保卫。

代表们向毛泽东介绍了本地土豪劣绅重利盘剥、欺压农民的情形。毛泽东听罢说：真是有土皆豪，无绅不劣！不少代表说：“农民运动起来后，土豪劣绅站不住脚，都跑了。”毛泽东笑道：“我来的时候，有人跟我诉苦，说农运‘糟得很’。”大家抢着说：“哪个讲‘糟得很’？我们都讲好得很！”

罗学瓚、唐寄凡分别汇报了本地农民运动的情况。毛泽东一一笔录下来。最后他总结说：依我看，农会被某些人说得越“糟”，就是越好。“糟”就证明农民发动起来了，反动势力动摇了。……要大胆发动群众，不要前怕狼后怕虎，要大手大脚，不要缩手缩脚……土豪劣绅非打倒不可。革命好比挖土，挖死几条蚯蚓算不了什么。全世界十五亿人，有十二亿多是受压迫的，两相对比，我们受压迫的人多，力量大，只会赢，不会输……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一县便发动了几万农民，无论什么力量都将压制不住！

毛泽东到了醴陵的消息传开，远远近近的农协干部和农民都争着要见他，找他说话，毛泽东应接不暇。于是，县委请他给全县农民作一个讲演，地点选在醴陵师范讲习所所在地文庙大成殿前。四乡农民纷纷前来，远道的还提着盛饭的竹筒，一时，竟有2万多人汇集文庙。

毛泽东穿一件布长衫，由李立三陪着进入会场。他站在一个高台子上，向着农友们，声情